

失衡的全球貿易：中美貿易戰的根源與新保護主義之挑戰*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黃登興

2018/12/06

目錄

1. 前言.....	2
2. 中國崛起與霸權威脅	5
2.1 1980 年代的恐日症與中國崛起.....	6
2.2 中國貿易地位的竄升.....	8
2.3 美中貿易的失衡與美、中、日三角貿易.....	11
3. 不對稱的貿易依賴	14
3.1 美中相互出口依賴關係.....	15
3.2 美中相互進口依賴關係.....	16
3.3 日本在中國貿易對象中的角色.....	17
3.3.1 相對出口依賴程度的分歧.....	17
3.3.2 相對進口依賴程度的分歧.....	18
4. 中日雙軸心的出現與向中傾斜	19
4.1 出口目的地軸心.....	19
4.2 進口來源軸心地位.....	21
4.3 小結.....	22
5. 中國貿易地位崛起與美國的中國症候群	23
6. 全球經貿組織的重整	26
6.1 WTO 的困境	28
6.2 NAFTA 變 USMCA	28
6.3 美國退出 TPP 後日本主導 CPTPP 變革.....	29
6.4 APEC	31
6.5 EU	31
6.6 小結.....	33
7. 結語：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	34
參考文獻.....	37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018 年 12 月 6 日「國際貿易新秩序」論壇引言報告。

1. 前言

國際貿易秩序總是在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間來回擺盪。自 1870 到上世紀一戰前，Bertil Ohlin 稱之為近代的第一波貿易黃金年代。國力最強的英國為這個年代自由貿易的經濟領頭者。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 年後），則明顯進入保護主義盛行的時代。著名的 Smoot-Hawley Tariff 於 1930 年 7 月在美國參議院通過，全球陷入貿易寒冬，以致全球經濟未能在 1929 年的大蕭條中快速恢復，間接誘致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 年至 1945 年）的爆發。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重整全球經貿秩序，協調出多邊談判機制，完成以去除關稅貿易障礙為目標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1950 年代以來半導體技術的問世，技術進步讓生產可以分段切割（fragmentation production）。除了傳統不同產業的產業間貿易外，同一產業乃至產品的跨國分工變為可行，加上運輸成本也在技術進步下大幅降低，全球貿易乃進入第二個黃金時代。

跨國產業鏈的垂直分工，隨著技術的進步與運輸成本的下跌而愈來愈細。貿易流量中，也逐漸出現愈來愈大比例的中間財與零組件。同一產業之跨國間互相依賴程度愈來愈深，全球貿易也在 GATT 零關稅目標下大幅快速增長。1970、1980 年代出現了因經濟開放而融入自由貿易體系，帶動經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nomy）或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如東亞的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及新加坡，或後續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四小虎等。

在這一波自由貿易擴張的第二黃金年代，保護主義思維則散成細細支流，散佈在開發中乃至已開發國家中；以保護新興產業為理由（如幼稚產業保護）或以國安與產業生存為理由（美國的 232 條款），以反傾銷、反補貼等等形式，藏在先進與開發中國家。以保護就業為由，在 GATT 之外另立規範的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er agreement, MFA）及以糧食安全為理由，而被 GATT 排除在外的農產品貿易等等，也都藏著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是由歐、美等已開發國家所主導。GATT 在 1995 年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限制紡織品自由貿易的 MFA 刻期失效，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成為 WTO 新的標的，衍生發展中國家集體對抗先進國的另類貿易戰場，也直接或間接導致後來杜哈回合的談判一直無解，而促使區域性貿易組織如 FTA 等大幅增加（後詳，見圖 11）。準此，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乃在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在產業龍頭與跟進者或下游加工基地間，擺盪進退。於是有 1980 年代恐日症下美日的半導體貿易戰爭。隨著本世紀初網際網路（Internet）的問世，有形無形的跨國貿易成本大幅下降，自由貿易再站上峰頭，直到 2017 年 1 月美國川普總統上台。

中國的開放，以豐沛人力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把貿易的第二黃金時代進一步推向更高峰。然而，隨著中國逐漸取代東亞四小龍及四小虎，成為東亞乃至全球加工基地而成功崛起，對照歐美等已發展國家所出現的所得分配惡化與成長的減緩，加上美國 1980 年代後期以來愈來愈嚴重的貿易逆差惡化，一種「中國威脅

論」¹的氛圍從美國逐步拓散，擴及至歐洲乃至其他各國。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下，被逼以技術讓出換取中國市場者，遍及歐美各國的跨國廠商²。中國的「2025 中國製造」之高科技產業自主的戰略目標，明顯揭露中國何以不惜以買、偷與逼求各種手段從各跨國公司獲得高科技的企圖。所以，中國威脅論於是不再如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美日貿易戰之侷限於美國的恐日症，而是擴及全球各已開發大國的恐中症。

2017 年 1 月川普以「美國再偉大」、「製造業回流」和從中國要回工作機會的政見，當選美國總統後，以一連串的外交與貿易保護政策，為中美的貿易戰爭吹響號角。全球貿易逐步進入新的保護主義時代³。無論後續發展如何，幾乎可以確定，貿易史上第二黃金時代已經結束，或正在結束中。全球貿易秩序不可能再恢復川普上任之前的情境，國際間的產業分工體系，勢必受到相當程度的沖擊。產業鏈重整為必然，如何重整成為重要的前瞻性課題。

川普經濟無疑地為保護主義劃開新時代。本文將依序探討中國如何崛起，與其如何沖擊美國的貿易地位及國內社會所得結構的穩定，導致川普在總統選舉勝出；以探討中美貿易衝突的根源。進一步，我們將論析川普政府主導的中美貿易戰，如何造成全球經貿合作組織的重整。在結語我們提出此新保護主義，對全球

¹ 中國外交部長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對西方世界流行廿多年的「中國威脅論」予以否定。亦否定新版「威脅論」，即 2017 年英國《經濟學人》所指中國的 Sharp Power（銳實力），為足以「透過文化壁壘，改變西方價值觀的利刃」。

² 中國於 2014 年 2 月完成「反壟斷法」的配套法案，當年開始以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濫用智識產權」，對佔有明顯技術優勢的外商進行密集調查，被認定違法者，將被課以前一年營業額之 10% 的罰金。見天下雜誌第 554 期（2014 年 8 月 20 日）的專題報導《中國威脅，全面來襲：複製你、超越你、取代你》。

³ 在美國讀博士學位，以國貿為專業的學者，大概在去年起都收到指導教授來函，以 Smoot-Hawley Tariff Act 的教訓為鑑，要求連署反對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

貿易秩序的挑戰，與在貿易理論的學術研究上值得關注的新課題。

2. 中國崛起與霸權威脅

美國川普總統的橫空而出，一聲「讓美國再偉大」點破中美建交以來，歷任美國政府所冀望的「中國夢」：希望中國和平崛起，並共同維護美國於戰後所打造的世界體制與美國領導的秩序。⁴

美國與中國建交以來，主流思潮認為透過中國經濟貿易往來，帶動其經濟發展，隨著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提高後，西方的民主人權思想自然會滲入中國社會，讓中國政體體質變成美國理想中的「民主」政體，同時不會危害美國戰後乃至冷戰結束後的全球霸權地位。在此理念下，雖經過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美國仍繼續其連結中國全球化的政策。柯林頓與布希政府繼續以更大幅度開放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2000年10月柯林頓總統正式簽署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待遇（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PNTR）法案，終止了近二十多年以來依據《1974年貿易法》對中國的逐年審查再給予最惠國待遇的貿易政策。2001年WTO通過中國入會案，布希總統亦宣告隔年1月1日起中美兩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正式生效。

此後，中國在國際貿易分工地位快速攀升，經濟持續以二位數的速度成長。美國在九一一恐攻事件後，疲於應付回教聖戰組織國際恐怖主義，亦樂見中國的崛起，並希冀其在這些國際事件上能與美國的合作。但隨之而來，崛壯中的中國，

⁴ 參見前亞太助理國務卿坎貝爾 Campbell 與 Ratner，在 2018 年 *Foreign Affairs* 合著，有關歷任白宮政府對中國崛起的期待與失落。

對全球資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其搜索購搶石油、礦源等行動，終於又引發中國威脅論之恐中情結的再度爆發⁵。

2005 年代表中國開放改革智庫的資深研究員鄭必堅，在知名外交事務期刊，以 *Foreign Affairs* 發文⁶，申明中國將會和平崛起，以解除近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快速經濟發展帶來的大量能源及資源進口需求，與快速的軍事擴張，所造成之全球各國各界對中國霸權的疑慮。文中強調，中國不會採用二戰前德國與日本等掠奪資源追求霸權的路線，也不會有冷戰時期追求霸權主導全球的企圖。

然而，2013 年《紐約時報》⁷報導中共內部的“9 號文件”，內容等同宣告美式中國夢的幻滅。該文件內容旨在警告中共高階領導人注意並消除中國社會中的七股反動潮流：首要為「西方憲政民主」，其次是「人權普世價值」、「媒體獨立和公民社會」及親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等等。到了 2017 年 10 月的中共十九大，完全廢除習近平的黨主席任期限制，更落實了美式民主不可能如美國所冀望，在中國體現更不可能有和平崛起而不對抗美式價值的大中國。

2.1 1980 年代的恐日症與中國崛起

大抵而言，中國 1980 年代之初，改革開放以來，得以豐沛低廉勞動力之優勢，逐漸取代其他傳統美國、日本與東南亞的生產基地，成為世界工廠，有其歷

⁵ 中國威脅論集其大成的代表作為 2011 年由 Peter Navarro 與 Greg Autry 合著的《Death by China》（中文翻譯本：致命中國）。書中細數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崛起後種種引起西方各國擔心的政策作為。值得一提的是，Navarro 在川普上台後擔任白宮貿易與工業政策主任，主導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政策走向。

⁶ Zheng Bijian (2005, *Foreign Affairs*),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⁷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8/130819_nytimes_cpc_document

史上的巧合與契機。美國在二戰後一方面領導西方民主國家建立國際貿易秩序，如 GATT 之成立進而發展為 WTO。另一方面為圍堵共產國家的擴張，透過外交、經濟及軍事的外援，建構其外交上的友邦，同時也形成產業發展與貿易上的相依夥伴。也同時養出足以挑戰美國經貿地位的夥伴；特別是在半導體革命帶來的高科技產業。1970 年代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挑戰為首波。1980 年代後期，美國、日本半導體的貿易戰，更是慘烈⁸。1993 年 Bhagwati 就以十九世紀末英國面對美國及德國經貿地位的崛起「大國殞落症候群」(Diminished Giant Syndrome) 來比擬當時充滿美國各界的恐日氛圍。

雷根政府的減稅與財政擴張政策，讓美國步入貿易與財政雙赤字的不歸路，乃有五大國 G5 之 1985 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根據此協議，日圓大幅升值，東亞其他各國如台灣、南韓等貨幣對美元也應聲大幅升值。日資以升值的優勢大舉進入併購美國企業⁹。“Rising Sun”小說與電影中的恐日氛圍，或稱恐日症 (Japanophobia) 厚厚壟罩全美，為當時美日半導體戰加油添火。另一方面，日本、台灣及南韓的廠商也趁幣值上升之利，轉往東南亞乃至中國等投資設廠。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等東南亞諸國，進一步讓崛起中的中國受到跨國公司的青睞，紛紛再將生產基地更深更大層面的轉往

⁸ 有關美日在半導體產業的貿易爭端，參見 Tyson (1992) 的《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雖然 1986 年美日簽訂了 Telecommunication Agreement，但只是美日半導體產業爭端的起點，日本依然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上穩定成長，並逐步成為美國重要競爭對手。

⁹ 指標性的併購案，有 Sony 併購 Columbia 唱片與影視公司及 Mitsubishi (三菱) 併購 1933 年落成的 Rockefeller center。

中國。此第二波的跨國直接投資湧入中國，讓中國迅速蛻變成世界工廠或產業大國。當然其產品最終落腳點，仍是全球最大消費區的美國，而且以中國的廣大勞力加上國家資本的刻意運作，讓美國的貿易赤字以更大速度攀升。而美國廠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off-shoring）並將大部分零組件代工外包（out-sourcing）也愈來愈大規模，在在都促成中國經貿地位大幅竄起的局勢。

值得注意的是，八〇年代之恐日症只侷限於美日之間的紛爭。這一次的「中國威脅論」帶來的恐中症，相對而言就不再侷限於美國，同樣的氛圍基本上是瀰漫中國以外的各個大貿易經濟體，如歐盟、日本、南韓乃至東南亞，詳細的論述我們在後面再說明。

2.2 中國貿易地位的竄升

中國就在全球化的氛圍中，在軍事與經濟上逐年壯大。經濟上中國成為全球主要加工基地。以豐沛又低廉的勞動力，在勞力密集的產品或下游加工製程上展現跨國分工的優勢，中上游產品零件的輸入加工再出口，隨著開放腳步愈來愈活絡。終於在 2009 年其總貿易超越德國，居全球第二位，以 2 兆 2,072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 2 兆 6,586 億美元，到了 2013 年進一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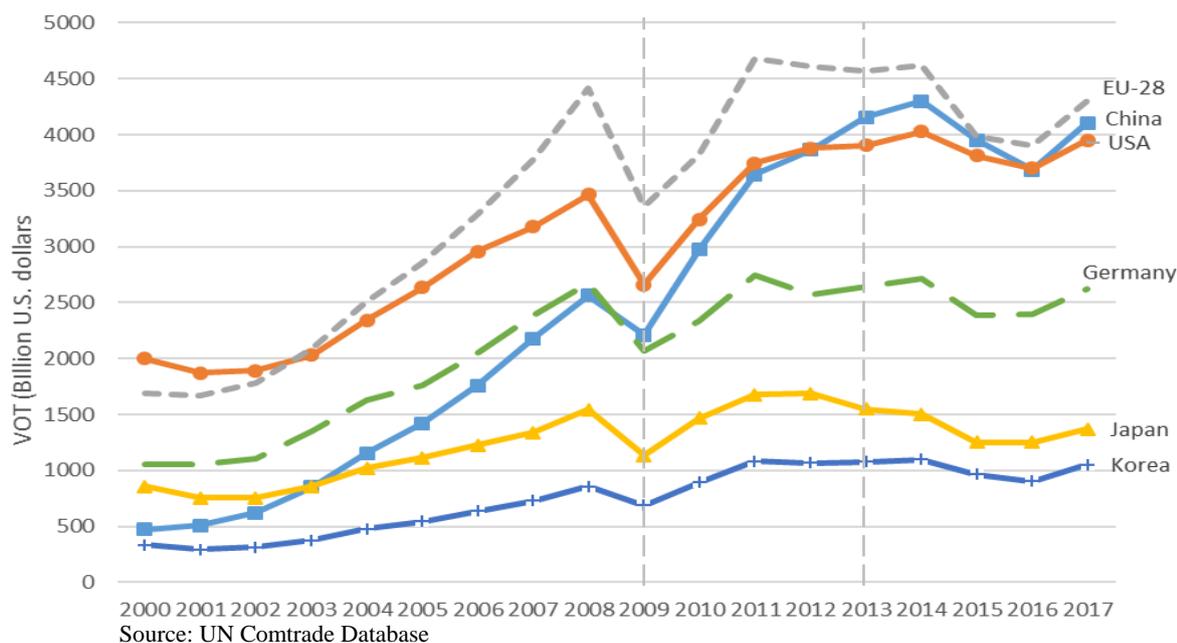


圖 1 總貿易量全球前五大

中國的出口表現尤其突出。其年出口值在 2004 年已經達到 5,933 億美元，成為居美國與德國之後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國。到了 2008 年全球陷入金融風暴後，2009 年中國年出口值更以 1 兆 2,016 億美元超過美國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如圖 2A 所示。此後，在全球貿易成長持續走低的趨勢下，中國出口仍逆勢上揚，大幅拉開其出口的領先幅度，不但遠高於居次的美國與德國之出口，更在 2014 年超過 28 個歐盟會員國（European Union, EU）整體的總出口。

相對於其年出口值的快速成長，並大幅領先全球各國，中國進口的成長速度則緩慢許多。但是，逐年增加的進口額，也讓其進口排名在 2004 年就超過英國及日本而居第三位，僅次於美國與德國。到金融風暴後的 2009 年就已經升到第二名，雖不能超過美國，但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與美國維持亦步亦趨的落差，如圖 2B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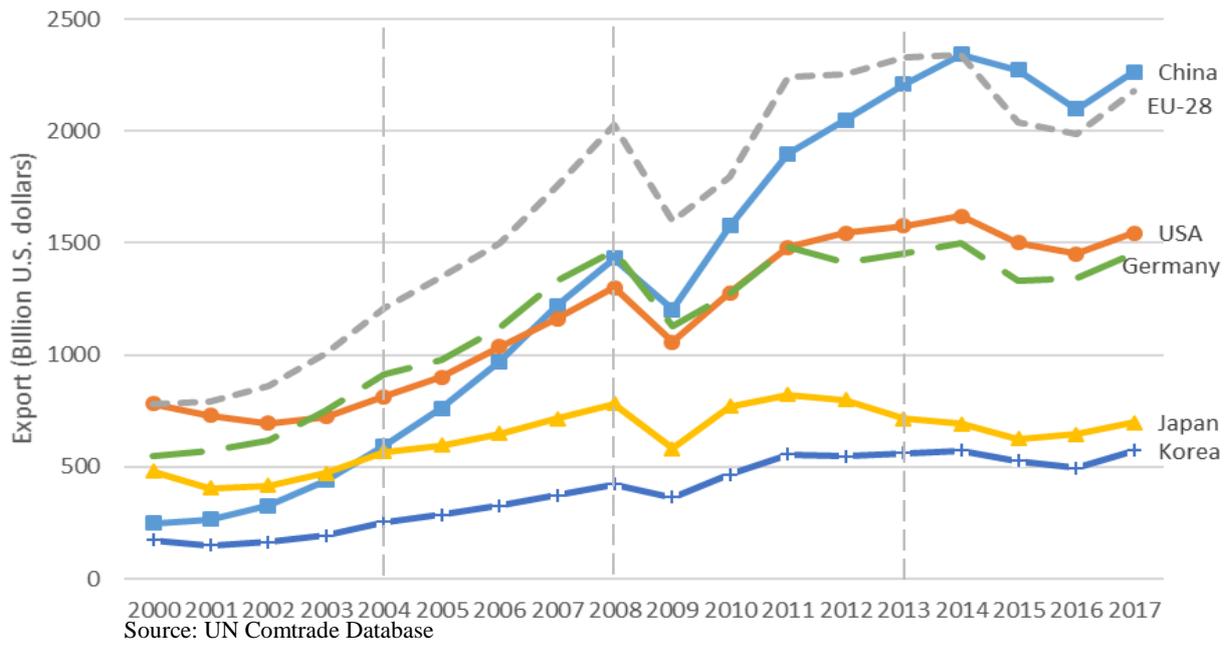


圖 2A 總出口全球前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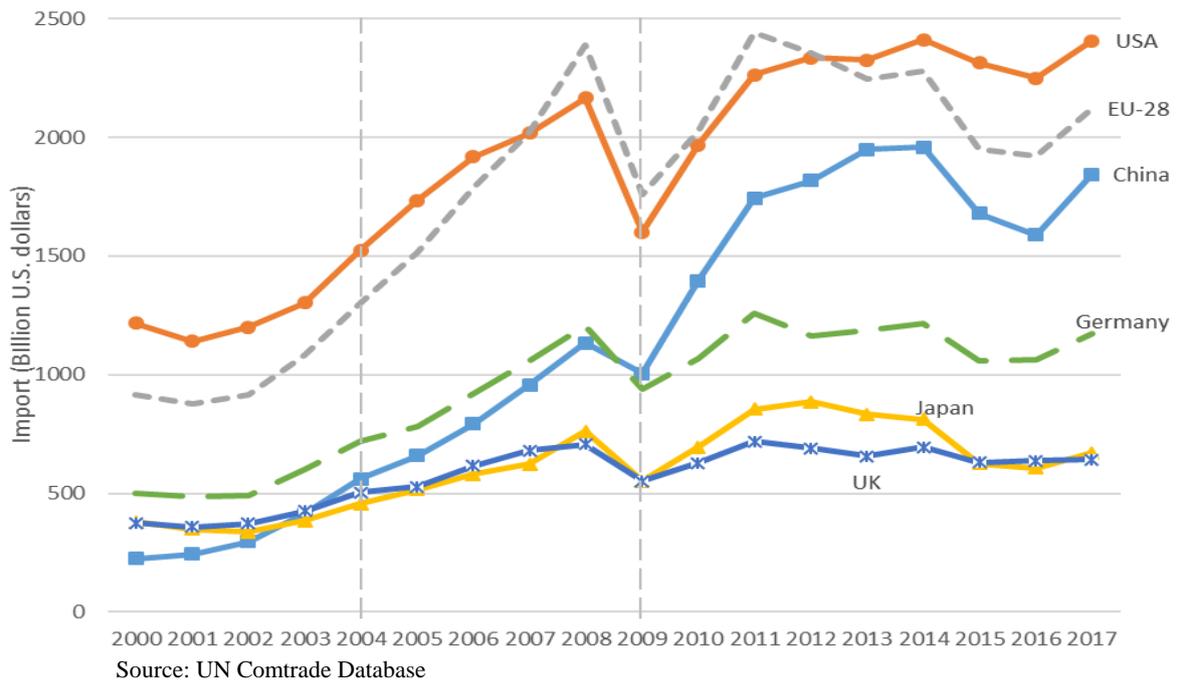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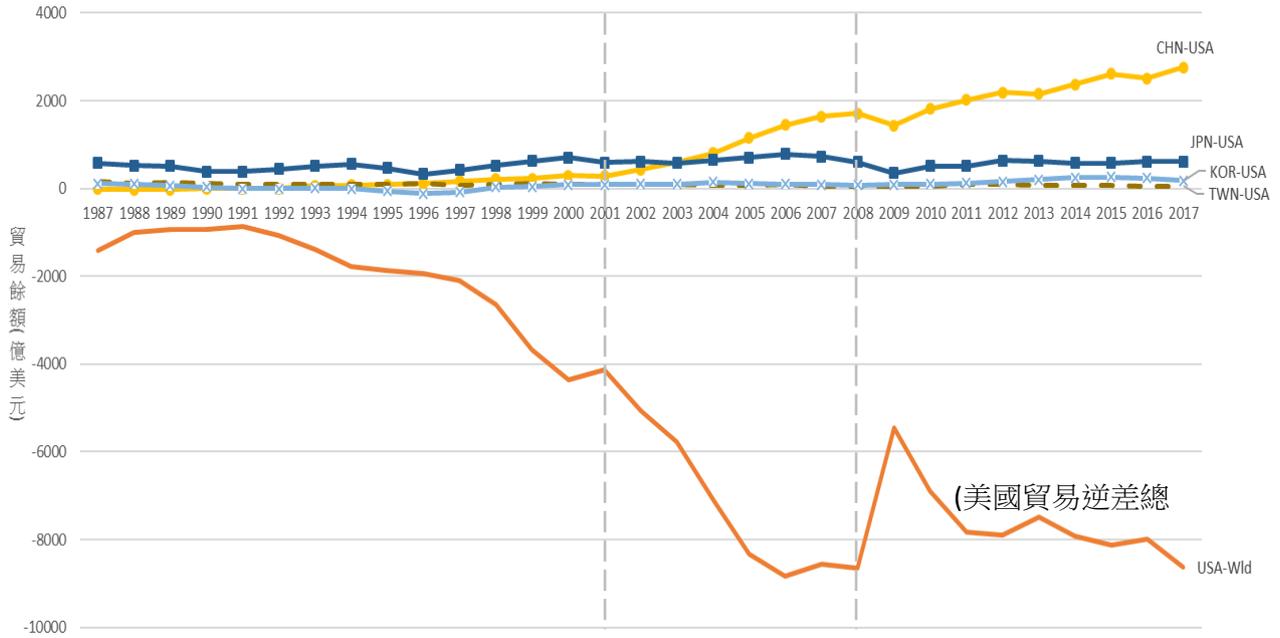


圖 2B 總進口全球前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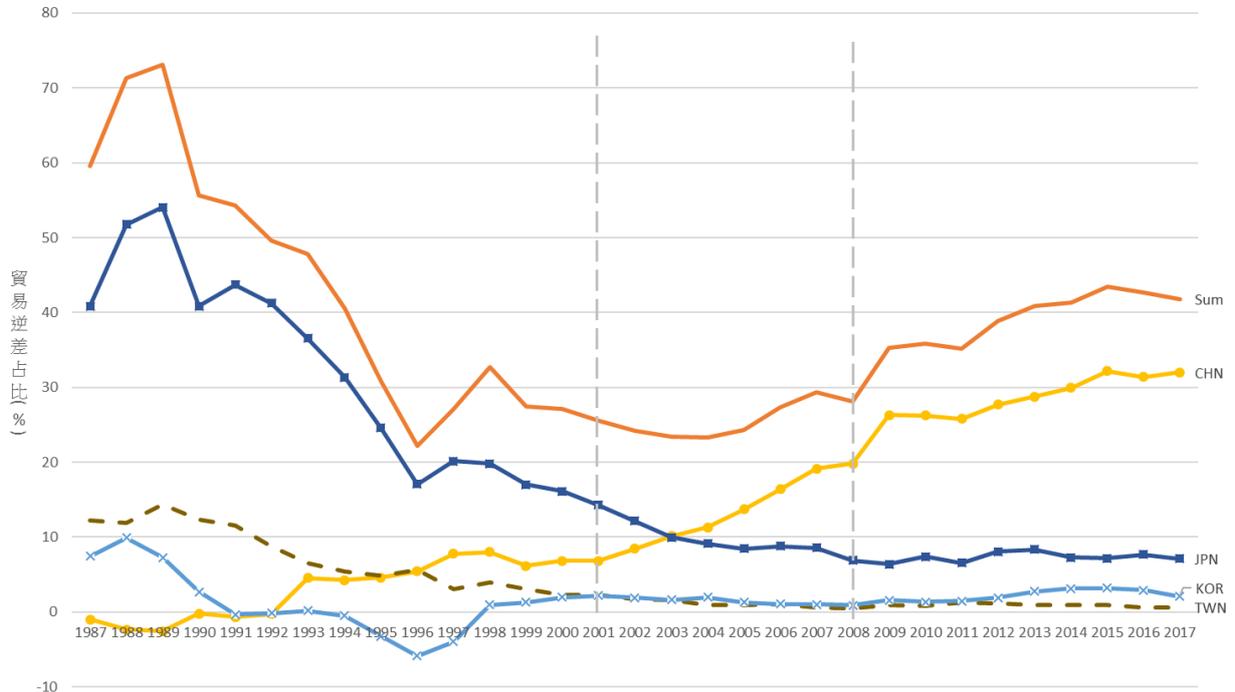
2.3 美中貿易的失衡與美、中、日三角貿易

美中之間的貿易不對稱關係，單從美國貿易逆差的來源分佈可進一步看得更清楚。如圖 3A 所示，美國貿易失衡始於共和黨主政的雷根政府年代，一系列的減稅與增加公共支出政策，造成美國有史以來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此後其貿易逆差一路擴大，特別是在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之後，如圖 3A 所示。同一時期，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則顯著的增加，2009 年雖因為前一年的全球金融風暴的全球性貿易萎縮而略為減緩外，隨後繼續上揚。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 2001 年只占了美國總貿易逆差（4,118.20 億美元）的 6.83% 如圖 3B（約 281.38 億美元），遠低於對日本逆差占比的 14.27%（587.86 億美元）。到了 2017 年美國貿易逆差達到 8,623.26 億美元，有 41% 來自東亞的中國、日本、南韓及台灣四國，其中來自中國的逆差就占了 31.99%（約 2,758.20 億美元）。居次來自日本的逆差則一路下跌到 2017 年的 7.10% 左右（約 612.26 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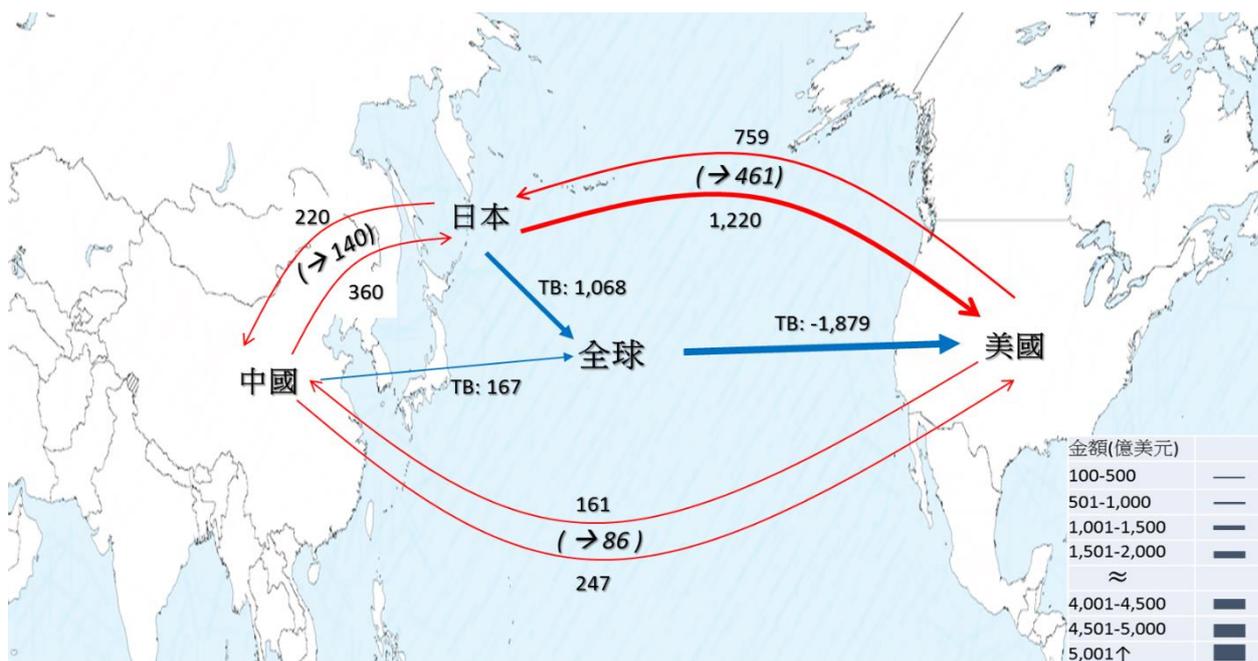
Source: UN Comtrade, 經濟部國貿局, 中國海關, 自行統計
 Note: 貿易差額=EX_{iUSA}-IM_{iUSA}, i=CHN, JPN, TWN, KOR

圖 3A 1987-2017 東亞各國及世界對美貿易餘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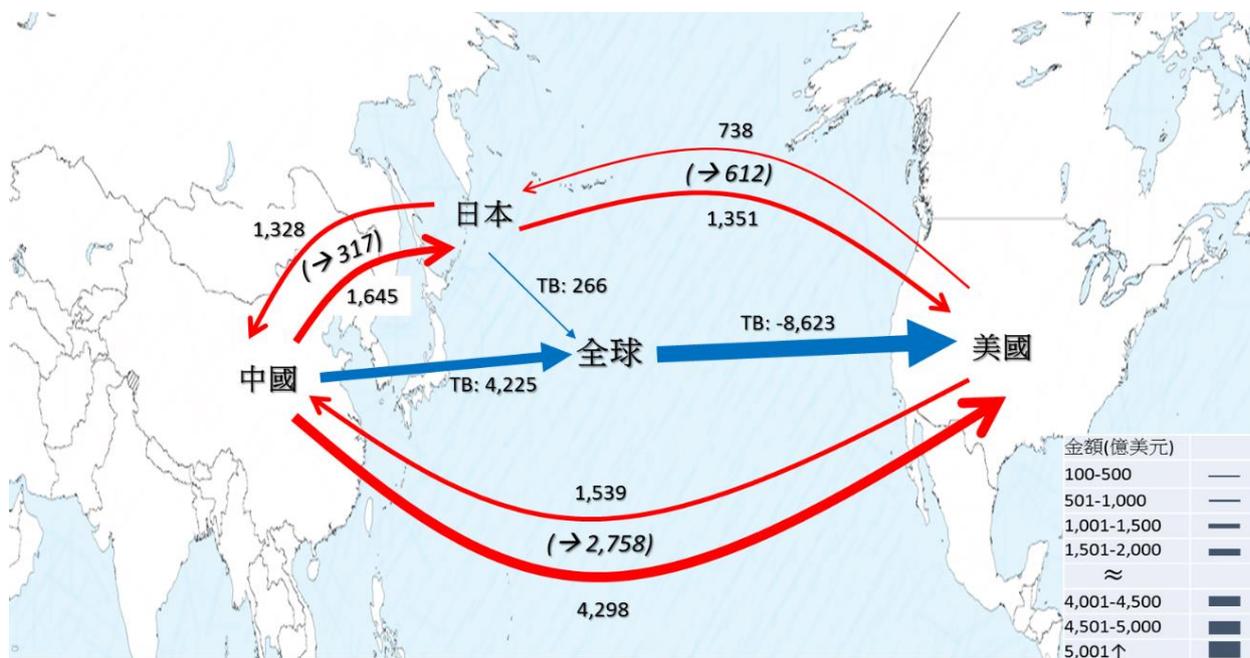
Source: UN Comtrade, 經濟部國貿局, 中國海關, 自行統計

圖 3B 1987-2017 美對東亞貿易逆差占總逆差之比



Source: UN Comtrade, 自行繪整

圖 4A 1995 年中美日三角貿易



Source: UN Comtrade, 自行繪整

圖 4B 2017 年中美日三角貿易

3. 不對稱的貿易依賴

除了前述以簡單的長期貿易趨勢，反映中國貿易地位的崛起，若進一步從相互依賴程度的變化來觀察，則這種不對稱的貿易型態，即傾向對中國之依賴現象將更明顯。首先，兩國之間相對的出口依賴程度，我們可應用 Baldwin(2004, 2006) 的軸心測度量來反映，令 HM_{ih}^X 代表 i 國以 h 國為出口目的地的依賴程度，其衡量公式如下：

$$HM_{ih}^X \equiv (X_{ih}/X_i) \cdot [1 - (X_{ih}/X_h)] = S_{ih}^X \cdot (1 - S_{ih}^M)$$

其中 $X_{ih} \equiv i$ 國對 h 國的出口值， X_i 為 i 國之總出口。因此， $S_{ih}^X \equiv X_{ih}/X_i$ 代表 i 國對 h 國出口的比重，反映 h 這個出口市場對 i 國的重要程度或單方面的依賴程度。 S_{ih}^M 則為 h 之總進口中，來自 i 國的份額。所以 $1 - S_{ih}^M$ 為 h 國自 i 國以外進口的比例。意義上， HM_{ih}^X 愈大代表 i 國相對愈依賴 h 國作為主要出口軸心 (hub)，但對 h 國而言， i 國為愈不重要的輻緣國 (spoke)。

進一步我們可依據此雙邊的軸心 (h) 及輻緣 (i) 關係，設計區域性的出口地軸心指標：以區域內各國出口比重為權數，對 $XH_{ih} \forall i \neq h$ 做加權平均，得到 $XH_h^R = \sum_i HM_{ih}^X \cdot S_i^X$ 代表 h 在區域 R 的軸心指標¹⁰。

同理，我們可以對照 HM_{ih}^X ，計算相對進口來源的雙邊軸心-輻緣指數或依賴程度如下：

$$HM_{ih}^M \equiv (X_{ih}/X_h) \cdot [1 - (X_{ih}/X_i)] = S_{ih}^M \cdot (1 - S_{ih}^X)$$

¹⁰ 參見 Huang et al.(2018)

XH_{ih}^M 愈大，代表 i 國對 h 國的進口來源依賴度愈大，或 h 相對於 i 為主要進口軸心的指數；進一步我們亦可以區域 R 為單位，以區域內各國的進口比重為權數，計算 $HM_{ih}^M \forall i \neq h$ 的加權平均，

$$\text{即 } MH_h^R = \sum_i HM_{ih}^M \cdot \frac{\sum_j X_{ji}}{\sum_j \sum_i X_{ij}} = \sum_{i \in R} HM_{ih}^M \cdot S_i^M$$

MH_h^R 愈高，代表 h 國在區域 R 中為各國愈重要的進口來源國。

3.1 美中相互出口依賴關係

首先，我們可應用前文指數來觀察美中之間的雙邊貿易依賴程度，尤其是其不對稱程度變化趨勢，如圖 5 之 $HM_{USA.CHN}^X$ 與 $HM_{CHN.USA}^X$ 線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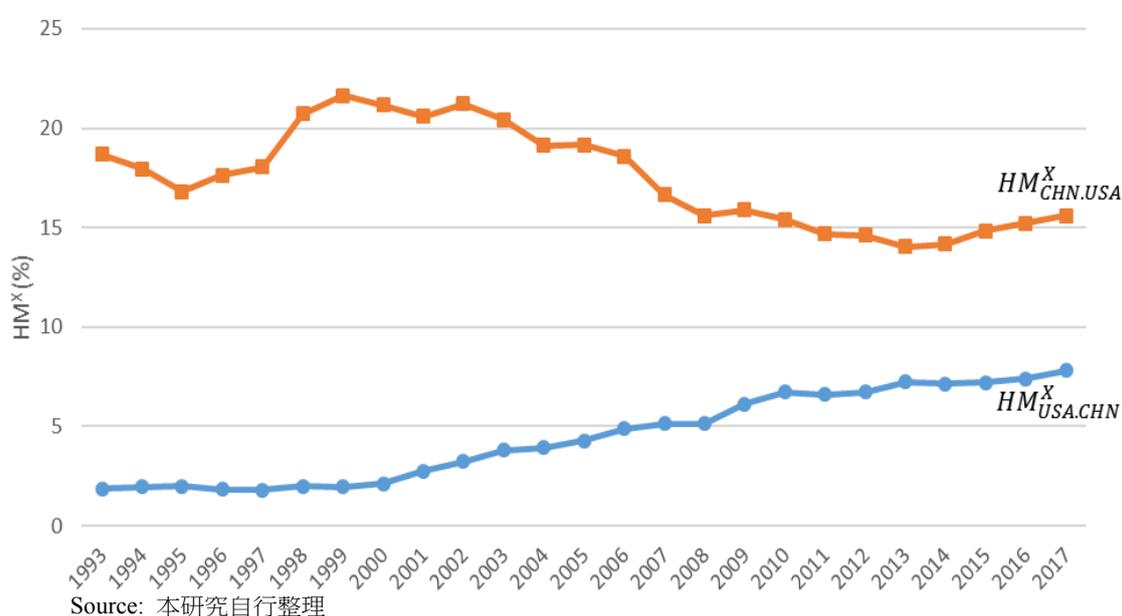


圖 5 中美 HM^X 指數變化

從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依賴指數變化，可看出美國市場做為中國的出口軸心地位，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間達到高峰，然後快速下滑，於 2011 年跌到 15% 以

下，到 2013 年在略為反轉，但幅度不大。此趨勢反映近幾年來美國作為中國更主要出口市場的地位。反之， $HM_{USA,CHN}^X$ 所反映者為，美國以中國為出口軸心(Hub)的情勢一直呈現穩定上揚的趨勢，雖遠不如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依賴程度。這個不對稱的出口依賴關係，充分顯現在川普上台後對中國進口品動用 301 條款，課徵懲罰性關稅，但中國卻無法對等的課徵自美國進口品的關稅，在貿易互課關稅戰爭上的實力不對稱事實。

3.2 美中相互進口依賴關係

美國與中國相互進口依賴關係的變化，如圖 6，相對於美國之依賴中國進口來源 ($HM_{USA,CHN}^M$ 線所示) 之穩定呈現在 5%到 8%之間， $HM_{CHN,USA}^M$ 反映的中國以美國為進口來源的依賴指數，則由 1993 年的低於 3% (明顯低於中國對美國的 HM 指數)，而一路增長，2004 年已經超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並繼續上揚。到 2015 年該指數已經達到 15%左右，而美國對中國的進口依賴尚維持在 6%而已。換言之，雖然中國對美國的總貿易順差一直在擴大，但在進口來源上愈來愈依賴美國的進口。實質上大多數為中上游關鍵性零組件，反映中美間之產業鏈的密切分工關係，這個情勢也充分反映美國總統可以片面動用貿易條款，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對手特定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美國廠商出口零組件給清單上的企業，其「攻擊性」貿易政策的殺傷力¹¹。

¹¹ 在國際貿易文獻上，針對出口管制 (export foreclosure) 政策之沖擊與利弊得失的理論分析，以 Spencer and Jones(1989)為肇始。此政策的自傷程度端看市場結構與下游加工回銷的需求彈性等而定。2018 年 4 月 16 日川普政府宣布 7 年內禁止美國企業銷售給中國的中興通訊公司；同年 10 月 31 日將中國國營色彩濃厚的 DRAM 廠商福建晉華列入出口禁止清單，均是經典案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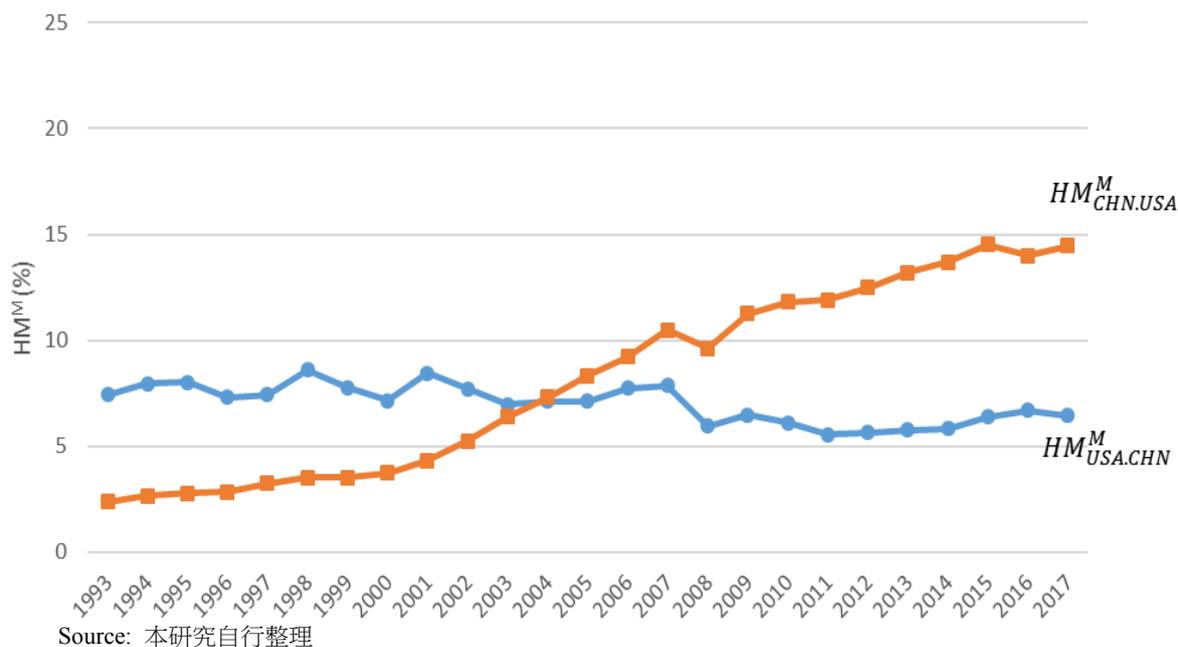


圖 6 中美 HM^M 指數變化

3.3 日本在中國貿易對象中的角色

3.3.1 相對出口依賴程度的分歧

前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依賴美國為出口軸心的現象，在日本與中國間的出口關係上則有顯著不同。如圖 7 所示，反映日本以中國為出口軸心的 $HM^X_{JPN.CHN}$ 線，雖逐年上升，但到了 2003 年才超越逐年下滑的中國對日本出口依賴 $HM^X_{CHN.JPN}$ 。換言之，不同於中國之依賴美國為出口軸心，日本則是以中國為出口軸心的程度，大於中國依賴日本作為出口軸心的程度。2003 年以後日本依附中國的出口，大於中國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並且一增一跌逐年顯著擴大。

得一提的是，相對於理論文獻上只侷限於既有市場結構下來分析此激進政策的利弊，顯然忽略了避免技術外溢或流出，導致市場結構改變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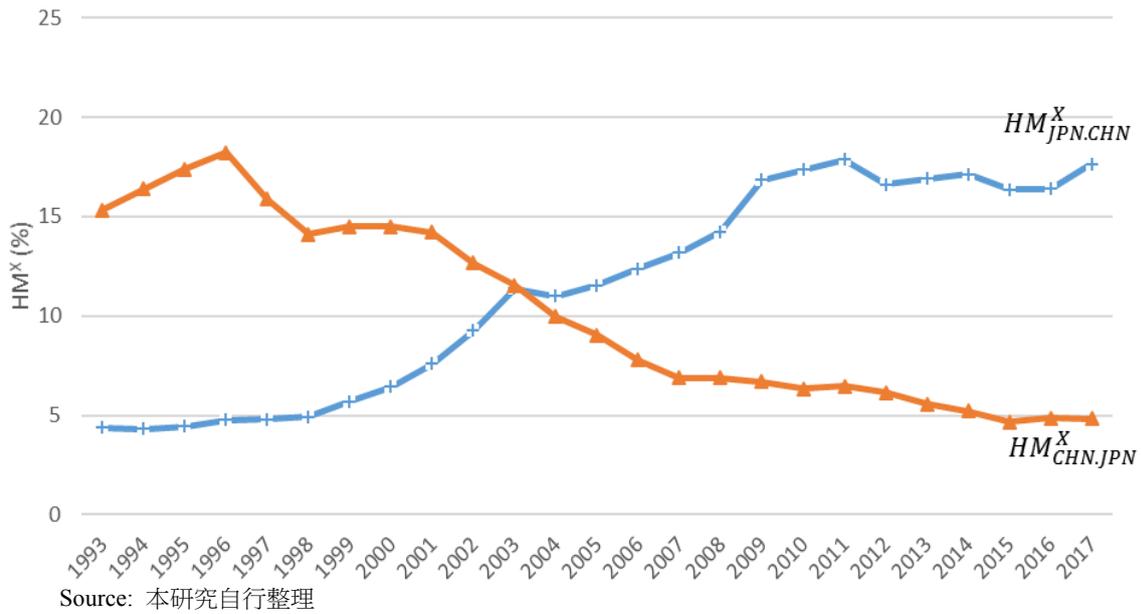


圖 7 中日 HM^X 指數變化

3.3.2 相對進口依賴程度的分歧

與前述中日相互出口依賴的趨勢完全相反，中日雙邊的進口關係，如 $HM^M_{CHN.JPN}$ 與 $HM^M_{JPN.CHN}$ 所示，分別呈現上揚與下跌趨勢。到了 2001 年以後 $HM^M_{CHN.JPN}$ 大於 $HM^M_{JPN.CHN}$ ，而且落差愈來愈大（如圖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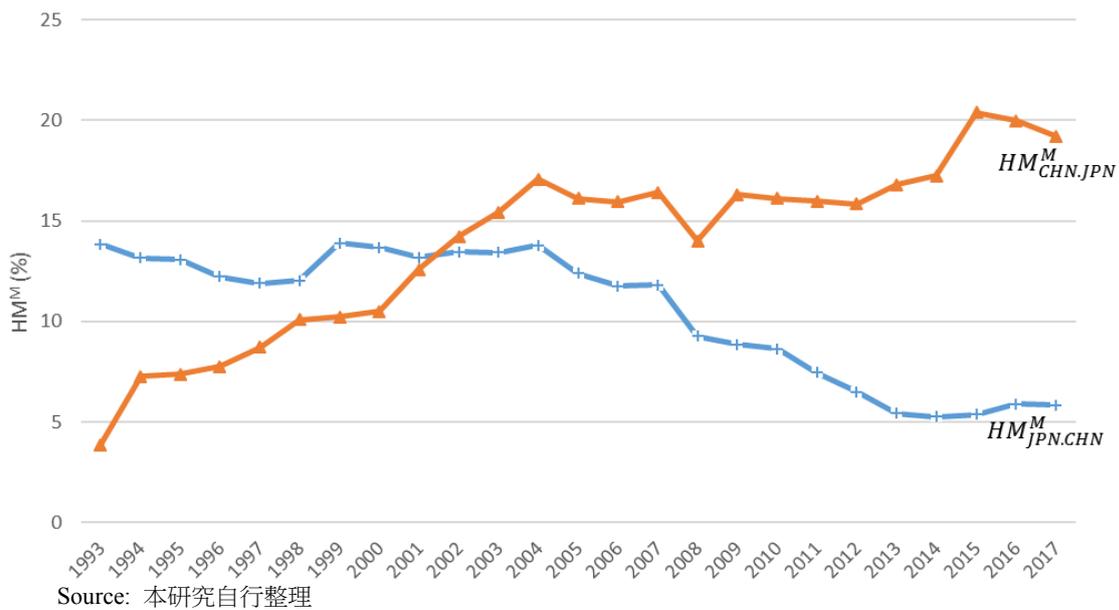


圖 8 中日 HM^M 指數變化

4. 中日雙軸心的出現與向中傾斜

除了前述中美及中日間雙邊貿易的傾向中國市場外，區域整體性的傾向中國趨勢更為明顯。東亞之中國、日本、台灣、南韓、香港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十一個經濟體，加上美國與歐盟計算得到區域貿易軸心測量趨勢變化，如圖 9 及圖 10。

4.1 出口目的地軸心

圖 9 為 1993 年以來各國根據前述公式計算後繪出的 XH_i 及 MH_i 趨勢圖¹²。同 XH_i 代表 i 國作為各國出口的的軸心指數：根據該國，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軸心在九〇年代以來的快速攀升情形。可以 1995 年與 2004 年為界，分為三個階段：

- (1) 第一階段在 1995 年之前，即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出口的軸心地位已經與日本不相上下。此反映無上所稱中-日雙軸心 (Twin-hub) 的現象。同此時期，東亞的主要出口軸心以美國為首，其次為歐盟，如圖中的 XH_{USA} 與 XH_{EU} 所呈現。
- (2) 第二階段起自 1996 年，原本與日本並駕齊驅的中國軸心指數，開始上揚，相對的日本出口的軸心指數，呈現下滑之勢，兩者落差日趨明顯。反映中-日雙軸心態勢之一起一落的質變。值得注意的是，同此時期雖然歐盟的 XH_{EU} 指數

¹² 此圖直接取自 Huang et al.(2018)，以各國總出口及總進口量來計算。理論上不同產業的跨國產業鏈分工因各國的相對優勢不同呈現不同的出口地軸心與進口來源軸心。Yang(2018)、Kuo(2018)分別就紡織業、自動化產業及製鞋業等進行分析。

變化不大，但美國則已經在 1999 年達到最高峰後，於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之後快速下滑。大抵而言，此階段中國的出口的軸心地位會竄升，不僅取代

日本的軸心地位，亦讓美國軸心地位下跌。

(3) 第三階段起自 2005 年，中國的出口的軸心地位居第一位並繼續竄升，與美國、

歐盟及日本等持續下滑的趨勢形成強烈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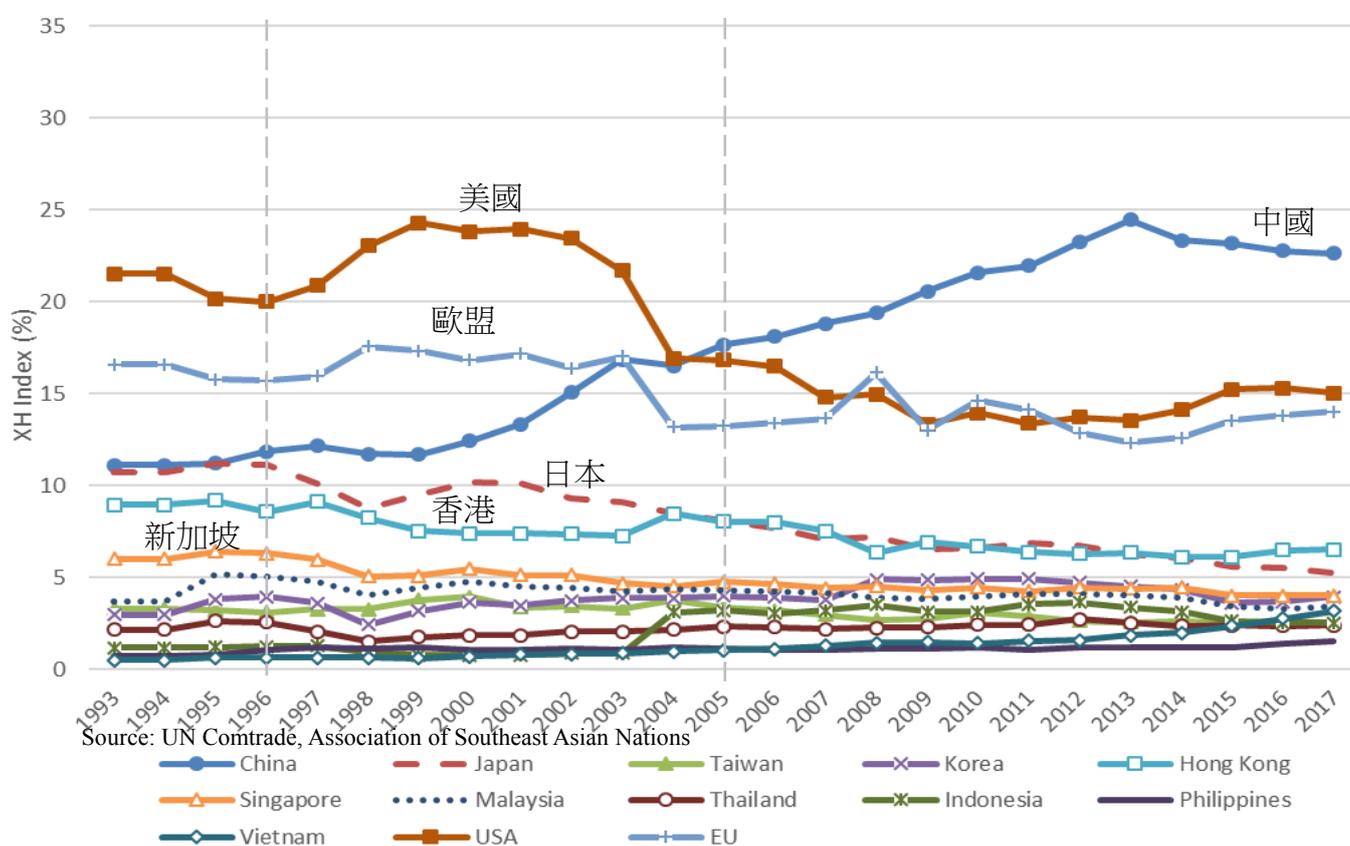


圖 9 出口目的地軸心指數（東亞、美國及歐盟區域）

4.2 進口來源軸心地位

相對於出口軸心地位，中國在 1990 年代初期就與日本不相上下，(1)其進口軸位的竄起而能與日本匹敵，大概晚了十年左右。如圖 10 所示，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在 2003 年以後近十多年來，其軸心地位才明顯超越其他各國。

(2) 在 2003 年之前，仍以美國居首，並遠大於居次的日本與歐盟。

(3) 在 2003 年後，中國進口軸心地位大幅提升，應是反映加入 WTO 後，成為全球首要製造工廠，有相對重要的被進口依賴的情形。2008 年因為金融風暴而下滑，隨後仍繼續升揚，對照 *MH* 值平緩下滑的歐盟、美國及日本，落差亦如同出口軸心一樣，逐漸擴大領先歐盟、美國與日本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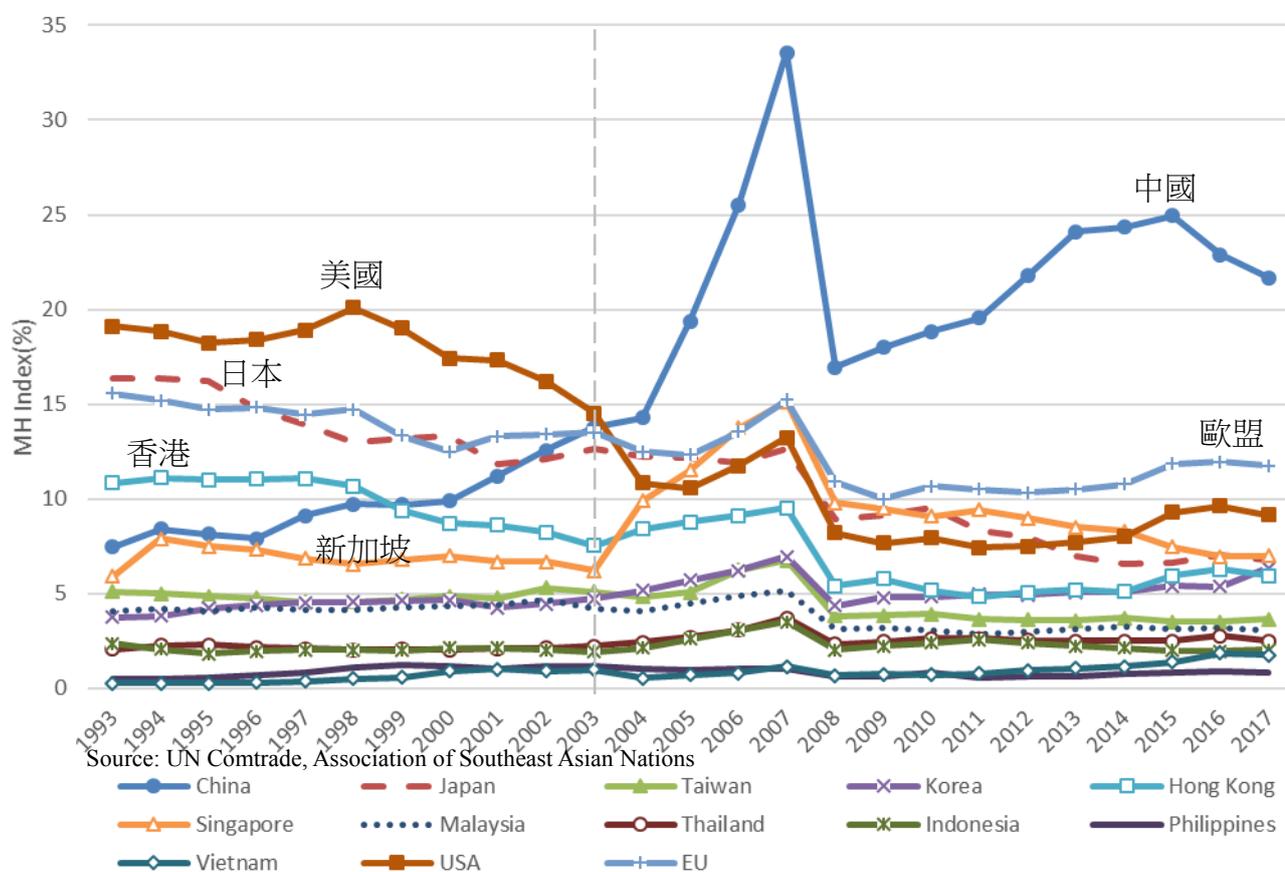


圖 10 進口來源軸心指數（東亞、美國及歐盟區域）

4.3 小結

整體而言，我們不論從全球貿易排名，中國、美國及日本雙邊貿易或東亞、歐盟與美國整體來觀察，中國經貿地位一枝獨秀的崛起態勢均相當明顯。從早期扮演世界工廠，東亞乃至歐美的加工基地，晉升到全球最大出口國，進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進口國，並持續維持高度的貿易順差，與美國長期的逆差成強烈對比。中國政策開放以來，以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路徑（後詳），首先追上日本，而在東亞貿易版圖上，出現中-日雙貿易軸心的現象；其軸心地位進而持續上揚，讓美國、歐盟及日本的貿易地位相對下跌，形成無論在出口或進口的軸心地位，中國有點鶴立雞群的局面。稱之為「全球貿易秩序失衡」應該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根據，亦是種下中美貿易戰爭的根源，同時也讓中國，除了成為美國貿易戰的對象外，也讓四處控訴美國之保護主義作為的中國，到處碰壁。

5. 中國貿易地位崛起與美國的中國症候群

中國在國際經貿地位單純的崛起，從跨國分工貿易利益的角度，應不至於直接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再起。由戰後國際貿易組成與秩序之主導者的美國來發起，更是匪夷所思。

理論上，中國作為美國之產業加工基地，為美國品牌廠研發設計與資本投入，帶來的報酬增量，絕對是大於中國勞動投入的報酬。是以從貿易利益的分配來看，新的保護主義不應該是由先進的、在產業鏈上佔有較大附加價值的美國來發動。然而川普選上總統後，立刻大張旗鼓採行保護主義政策。並且抨擊現行由美國主導建構的多邊貿易組織，如 WTO 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都不利於美國，認為其遊戲規則對美國不公平，並聲稱將重新談判現有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更恣意引用美國的「貿易擴張法」之 232 國安條款與「1974 年貿易法」之 301 公平貿易條款，動用行政命令發動充滿保護主義的貿易戰¹³。選前以美國優先、製造業回流及創造工作機會為主要政見，選後大張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直接對中國進行貿易戰爭，在歷經今年 7 月 6 日與 8 月 23 日，分別針對中國進口之 340 億與 160 億美元的產品課徵 25% 懲罰性關稅後，9 月 24 日再對其他 1,000 億自中國進口品課徵 10% 關稅。在面對中國選擇性的關稅報復後，川普所屬的共和黨仍能在今年 11 月 6 日期中選舉，有相當程度的

¹³ 首先，在 2017 年 3 月初宣布引用「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對進口鋼鐵和鋁材進行國家安全調查，對進口鋼鐵製品加徵 25% 關稅對進口鋁製品課徵 10% 關稅。接著於 2017 年 8 月 14 日根據美國《1974 貿易法》的 301 條款，以行政命令指示 USTR（美國貿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 對中國違反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調查。

「勝選」(共和黨雖輸了眾議院,卻在參議院明顯勝出),其民意支持度不減反增。這結果反映了中國崛起對於美國國內的沖擊,不是單純的貿易利益的跨國分配問題,應該是面對中國貿易競爭,導致其國內所得分配不均與失業惡化所致。

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體制下,當貿易導致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惡化,而且進口競爭受害者的人數占多數時,貿易保護主義必然逐漸形成主流民意。以下我們從這個不對稱全球化(Asymmetric Globalization)¹⁴角度來分析,何以中國挾著十三億人口快速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導致新保護主義浪潮興起之不可避免。

中國症候群在美國(China Syndrome)

關於美國勞動市場之失業、薪資停滯等現象,與中國貿易的關係,自198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個學術界熱門的爭論課題(參考Feenstra, 2010)¹⁵。理論上,只要是貿易對手國是相對薪資低廉的國家,其勞動市場就面對更多的對方低薪勞工之間接競爭,而面對薪資停滯與失業增加的壓力。在完美的前提假設下,自由貿易下雖然各種要素(資本、勞力、技術與經營能力等)的報酬有增有減(在出口擴張部門的相對重要投入、要素之報酬增加,進口部門則相反,造成所得不均)。但是加總起來,貿易國整體利益是增加的(貿易利得),透過適當的財稅政策,可以將受益者的部分所得移轉給受害者,補償其因為外來貿易競爭的所得損失。

¹⁴ Lee & Huang (2017)從理論上分析超級人力大國加入全球貿易,如何影響產業鏈的跨國分工調整,特別是產業鏈上或中下游移向大國的情境。

¹⁵ 參閱 Feenstra(2010)及其相關文獻,有關貿易與薪資落差的理論證實。

然而現實中，這種完美的情況並不存在，課徵機制往往存在一些漏洞。甬說資本利得容易逃竄到課稅天堂（Tax haven）的國內之普世現象，而且移轉支付也不見得能讓真正的貿易受害者獲得足夠的補償，遑論因為產業沖擊導致結構性變化，以致在進口競爭部門失去工作者，往往無法順利在擴張部門找到工作。換言之，在全球化自由貿易下，失業與所得不平均都將惡化，並且是個累積性的無解難題。

Autor 等（2013）以中國症候群（China Syndrome）為題，針對 1990 年到 2007 年全美國通勤區域（Commuting Zone）的在地勞動市場（Local labor market）進行實證研究，證實暴露在進口競爭下的區域，明顯更受到失業與薪資停滯的沖擊，而其中製造業受雇人數的下降，有 25% 可歸因於來自中國產品的進口競爭。在論文最後 Autor 等（2013）進一步指出，進口競爭造成的失業與薪資停滯，導致家戶所得大幅下跌，引發聯邦與地方政府在社會救濟的財政負擔大幅增加。對照之下，政府設立貿易調整補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機制，以協助受貿易沖擊而失業者，所發揮的功能則微乎其微。

值得注意的是，這來自中國產業與貿易競爭造成的失業與所得不均之社會問題的中國症候群或廣義的「中國威脅論」，並不限於美國。所以，在下一節討論中，我們將發現當中國反而舉起自由貿易捍衛全球化的大旗，在各國際組織中控訴美國掀起貿易保護戰時，並未得到太多的共鳴。大抵而言，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反而不利於中國。

6. 全球經貿組織的重整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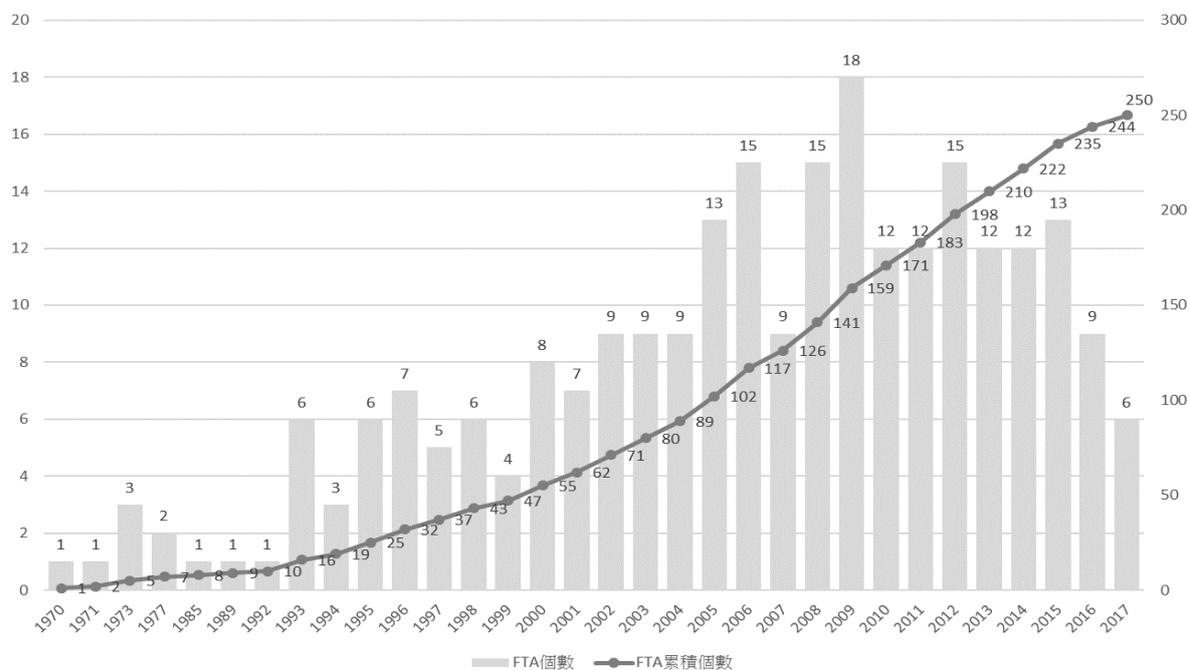
川普 2017 年初上任，立刻以行政令宣告退出前任總統等籌組多年的 TPP，並揚言重啟美國簽署的 FTA，特別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與美、日、韓 FTA，亦多次聲明不再服從 WTO 的規範等作為，讓全球的區域性經濟組織重整充滿變化。日本乃趁勢接手 TPP，中國趁機宣揚其亞投行、一帶一路，拾起捍衛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大旗，從本來被認定是極為盡各種手段策略保護中國大陸市場的“非市場經濟體”，突然變身為取代美國的全球化捍衛者領導國。

有趣的是，在 WTO 登記下的 FTA 於 2017 年已高達 250 個，而川普所要廢除的 NAFTA，卻是在其 1994 年簽署之當年，對全球 FTA 之快速增加有相當明顯的帶頭作用者（見圖 11）。多數 FTA 均在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下，流於潮流下的形式，受到川普經濟沖擊自然有限。例如東協，其發展有自主的步調，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預計仍將在緩慢的步調中逐漸前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源自 2004 年東協加一（中國大陸）、2006 年的東協加三（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而 2011 年的東協加六（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紐西蘭、印度及澳洲）；基本上一路發展已累積到 2017 年的第 20 回合的談判，實質上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因此，川普上台後，主要的影響對象除 WTO 外，值得關注

¹⁶ 此節根據黃登興(2018, 經濟年鑑)更補。

者，當在 NAFTA、EU 與 TPP 等等，其相應之各經貿合作組織的會員分佈，則

如圖 12 所示。



說明：左軸為長條圖的參考軸，右邊為折線圖的參考軸。

資料來源：WTO 區域貿易協定資訊系統 (RTA-IS,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圖 11 全球 FTA 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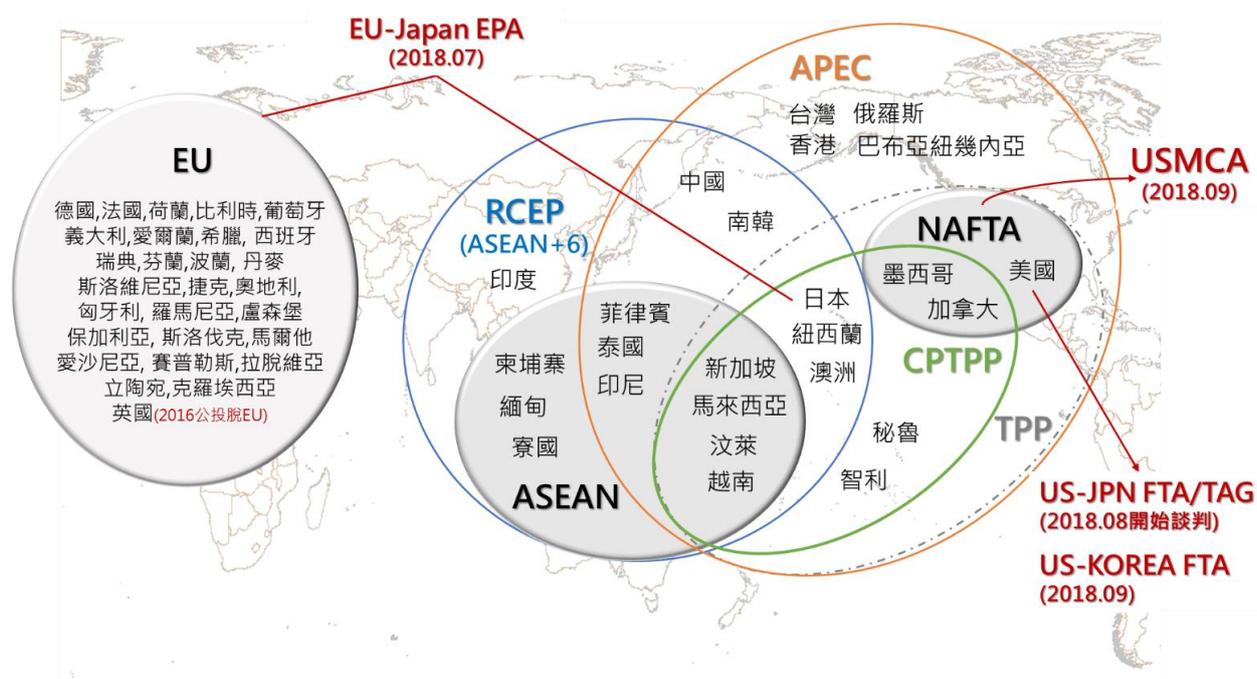


圖 12 各經貿合作組織的會員分佈

6.1 WTO 的困境

首先就 WTO 來看，在共識決的機制設計下，WTO 於 2017 年並未達成任何實質的貿易自由化進展。歐美等西方國家與中國、印度與巴西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在農業保護與智慧產權等議題上依然陷在僵局裡。2017 年的部長會議只在電子商務協助中小企業，削減非法漁業補貼及推動法規透明化等議題上，達成持續推動的空泛共識。

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在川普不補齊 WTO 法官人數的杯葛下，近於停擺狀態，無力處理兩個重要的爭議更讓 WTO 的前景岌岌可危：一者為美國與歐盟根據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協議書」第十五條規定，2016 年 12 月起在對中國反傾銷中採用的「替代國」價格計算傾銷幅度的做法，必須無條件終止，不得再以中國是否為市場經濟為理由，對其傾銷產品實施高達 300% 以上的報復性關稅。美國政府在 2017 年 11 月正式提交 WTO，美國將比照歐盟，繼續在反傾銷調查中，拒絕採用中國「非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價格和成本，而採用符合市場經濟的第三國（替代國）數據。另一者為俄羅斯以可能退出 WTO，來抗議歐盟對其禁止進口歐美豬肉進行索賠 13.9 億歐元的訴求，並指責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本身完全違反 WTO 規則。

6.2 NAFTA 變 USMCA

其次，NAFTA 在川普就任後首當其衝而重啟談判。從開始談判至 2018 年 2 月，川普政府提出的多項重大改革，包括修改汽車自製率規定即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¹⁷、爭端解決機制¹⁸、加拿大乳製品業未自由化¹⁹以及 5 年後 NAFTA 自動退場的落日條款，皆讓加拿大與墨西哥難以接受。加拿大更表示美國若執意移除 NAFTA 中重要的爭端解決機制，加拿大可能退出談判。且因三方談判進度緩慢，據加拿大官員表示川普宣布退出 NAFTA 的可能性更大。2018 年 2 月 26 至 3 月 5 日，在墨西哥市舉行的第 7 輪談判，墨西哥也表示若美國堅持對墨西哥進口的產品課徵關稅或實施配額，墨西哥將終止 NAFTA 的重新談判。終於在 9 月底經過多方折衝妥協後，NAFTA 更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預計在 11 月 30 日等待後續經過各國國會認可就生效。USMCA 最受矚目的是納入所謂的「毒丸款項」，即任一會員國與非市場經濟國簽定貿易協定，其他會員國得退出 USMCA。此款明顯是沖著中國而來。

6.3 美國退出 TPP 後日本主導 CPTPP 變革

川普 2017 年元月 20 日就任後大動作的立刻簽下行政命令讓美國退出 TPP，舉世譁然。TPP 為美國前一任總統歐巴馬，在面對中國崛起而看到東協透過東協加一與加三（中國、日本與南韓）明顯傾向中國的情勢²⁰，企圖重返亞洲所主導

¹⁷ 加拿大反對美國提出調高汽車自製率的要求。根據 NAFTA 協議，轎車或小貨車 62.5%的淨成本須出自北美地區，才能享有關稅優惠，而川普政府擬將這項門檻由 62.5%拉高到 85%。但北美汽車產業也反對川普的要求，聲稱此舉將削弱市場競爭力並傷害區域供應鏈。

¹⁸ 第 19 章有關非法補貼和大量傾銷的爭端解決機制，這個爭端解決機制由美國、加拿大兩國專家共同組成，具有強制執行力，且美國常常敗訴。加拿大很重視這個爭端解決機制，因為這個機制能夠確保反傾銷與反補貼政策「公平地執行」。而軟木製造商則強烈支持川普政府廢除，認為此制度缺失多過益處，尚有 WTO 爭端解決機制等其他工具可用。

¹⁹ 原本的 NAFTA 協定中，加拿大乳製品業未自由化。此已成美國和加拿大之間長久存在的摩擦來源。據美國乳製品界表示，乳製品業是川普政府可以降低貿易逆差數十億美元的產業。

²⁰ 除了 FTA 的傾向中國，我們從實際貿易流向上也證明 1990 年代下半形成的東亞貿易之中日

的戰略性貿易組織；其內容更以保障美國產品進入亞洲市場的「公平」競爭與跨國投資保障的目的來設定。嚴格來講 TPP 應該是極有利於美國的貿易合作協約，特別是智財權的保護，以及允許跨國投資公司得以對當地政府提出控訴之權利。TPP 除了是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戰略，消極而言亦是美國企圖阻抗中國經濟勢力在東亞擴張的一著棋。川普宣布退出後，日本接手調和其餘十國後，擱置了許多不利於美國以外之會員國的 20 項條款（其中有 11 項與智慧財產權相關：包括生物新製劑的有關資料保護期與延長著作權期限等），於 2017 年 11 月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會議期間達成共識，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並於 2018 年 3 月 8 日完成簽署，形成 5 億人口、經濟規模 20 兆美元、GDP 占全球 13% 的新經濟體。

TPP 一方面是美國企圖阻抗中國經濟勢力在東亞擴張的「圍堵」策略，其內容涉及諸多境內管制的撤除，自然不可能為非市場經濟本質的中國所接受而加入，所以若 TPP 能成立，必是一個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的組織。中國政府於是以一帶一路與設立亞洲開發銀行來因應，一方面為中國過剩的產能尋找出路，另一方面透過低率的開發貸款與資金協助拉攏一帶一路所經過之歐亞各國，以突破歐巴馬的經濟圍堵。川普一上台就即刻推翻前朝的佈局，而中國則順勢在一帶一路策略的帶引下順勢高唱貿易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主張，儼然成為捍衛自由貿易的大國。

雙軸心現象，在進入 2000 年後呈現明顯的傾向中國軸心的現象。東亞各國含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與東協諸國。參見 Huang et al.(2018)、Kuo (2018)及 Yang (2018)。

6.4 APEC

APEC 基本上淪為各國外交的秀場，其促進經貿自由化的主要目標，因為共識決議前提的設計，淪為口號。主要的「成就」反而是前述 2017 年 11 月 11 日在越南召開的領袖會議，讓原本支美國以外之 TPP 會員國，在日本帶領下，獲致以 CPTPP 來取代原來的 TPP 的結果。

中美兩國的貿易紛爭，繼續延燒到 APEC 的場合。今年（2018）11 月在巴紐（Papua New Guinea）召開的領袖會議，在美國副總統彭斯與中國習近平總理，兩人針鋒相對的言論下，首回在沒有發表領袖共同宣言之下閉幕。根據 CNN 的報導，中國極力反對宣言中出現「We agreed to fight protectionism including all unfair trade practices.」的「不公平貿易行為」（unfair trade practices），顯然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意指中國，並為中國以外各會員所共同認知。

6.5 EU

再看擁有 28 個會員國人口 5 億的歐盟，其變動之最大者莫過於英國 2016 年 6 月 24 日之通過脫離歐盟的公投，並隨後在 2017 年 6 月起英國與歐盟展開的三階段談判。第一階段從 2017 年 6-12 月展開，內容鎖定在分手費、雙邊公民權利保障與愛爾蘭邊境開放與否等「分手議題」；第二階段從 2018 年 1-6 月開始，主旨為「未來關係」，重點內容包括脫歐後的商業關係與市場、勞工談判；第三階段則將從 2018 年 7 月開始到 10 月，雙方將針對歐盟法律、自由移動與歐盟補助

討論，並確認脫歐後雙邊具體的「緩衝期」條件。但雙方目前已確定，無論是硬脫歐還是軟脫歐，英國都將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午夜正式退出歐盟。

當然英國的脫歐公投發生在先，與美國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無關，但是後續 EU 的發展，受到影響將無可避免；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白熱化後，各國爭相拉攏歐盟龐大的市場。在今年 7 月 6 日首波關稅戰正式爆發，美國對中國進口品課徵 25% 的懲罰性關稅。中國立刻提出反制的報復性關稅，並且在中歐高峰會上指責美國發動關稅戰，違反貿易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不是。但是歐盟反而重申其在 6 月就向 WTO 提出的申訴，指控中國「侵犯歐洲公司知識產權」，並提及 WTO 需要針對「強制技術移轉與航也補貼問題」，制定新的規範。並在 7 月 26 日歐盟與美國的聯合聲明中的第四點聲明，「我們同意共同致力於保護美國與歐盟的公司，更好地保護他們免於受到不公平的全球貿易行為之侵害。為此，我們會與有著類似想法的夥伴緊密合作，推動 WTO 改革，以解除不公平貿易行為，包括知識產權竊取、強制性技術轉讓行為及工業補貼與國有企業造成的扭曲以及產能過剩問題」²¹。歐盟顯然在呼應美國在 4 月份於 WTO 提出對中國的類似控訴。

又針對美國最近一波於 9 月 24 日對自中國進口的 2 千億美元產品課徵 10% 關稅，雖然中國發表《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再度趁機

²¹ 美歐聯合聲明《Joint U.S.-EU Statement following President Juncker's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其第四點如下，“Fourthly, we agreed today to join forces to protect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mpanies better from unfair global trade practices. We will therefore work closely together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to reform the WTO and to address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industrial subsidies, distortions created by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overcapacity.”

在聯合國控訴，但顯然各國的反應也不如其意。9 月 27 日美國與日本在聯合國會外的聯合聲明，雙方除了同意展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外，更表明將以更加保護美國與日本企業和勞工，避免受到「第三國」非市場化導向的政策影響。當然，第三國也是明顯意指中國，在這種中美貿易衝突的氛圍下，無形中也促成了歐盟與日本在 2018 年 7 月順利完成簽署歐日經濟夥伴協定（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U-Japan EPA）。

6.6 小結

綜合而言，川普一連串的保護主義作為，顯然最後都指向中國，控訴其「不公平貿易作為」，包括強制性技術移轉、不尊重智慧財產權及國家資本的市場干預等，而中國趁勢反而舉起捍衛全球自由貿易的旗幟，在歐盟、聯合國等多邊國際論壇場合，反訴美國之貿易保護主義作為。

全球各主要貿易大國，折衝於中美之間，合縱連橫，企圖在中國、美國與歐盟三大市場中，尋覓最佳戰略。顯然無論在 WTO、APEC 或 EU 高峰會等，各個場域與各個論辯場景，都反應雖然各國不盡然認同川普訴諸關稅戰的保護主義作為，但對於中國之「不公平貿易」作為，似乎是同聲一氣。換言之，崛起的中國顯然已經挑動了美國維護其首席霸權地位的敏感神經，也同時讓歐盟、日本、韓國乃至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多數在國際經貿上有相當分量的國家，對其近十多年來貿易發展策略的「不公平性質」，有異口同聲的撻伐與責難。

7. 結語：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

川普的橫空而出，重手揮向中國好不容易爬上全球貿易第一、GDP 第二的寶座，一語道破中國「和平崛起」的國王新衣，同時也為貿易史上第二波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畫下句點。

相較於 1980 年代美國及日本高科技產業的貿易戰，特別是美日間的半導體產業爭霸戰，乃是侷限於已開發國之間的貿易戰，當時的後進開發中國家，如台灣與南韓，僅是單純兩強背後的加工基地。這次中美貿易戰，雖也是由高度技術領先的已開發國家美國所發動，以開發中國家（中國）為主要對象，但相較於恐日症時期的美日貿易戰之間，這一波貿易戰無論涉及的國際成員與產業，均相對又廣又深。

首先是歐洲及日本等發展先進國家，無不多多少少參與了這次的中美貿易戰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各國不見得同意川普激進的貿易關稅保護主義政策，但卻相當程度上一致認同美方對中國所指控的「不公平」競爭手段，如以國家資本補貼中國企業，並強力干涉外商在中國投資行為，強迫以市場換技術以取得外商之關鍵技術，和對於智財權的放任不管等等。

今年 7 月 6 日以來連續三波對美國自中國進口課徵關稅的手段，已經明顯牽動跨國廠商的國外投資布局，後續中美貿易戰再升高，也將進一步讓全球生產鏈大幅調整，無論情勢如何，全球貿易告別第二波黃金時期，進入新的緊縮階段，為必然趨勢，因而全球性經濟成長的減緩應在預料之中。

綜觀這次美國為首所發動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乃有幾個大方向值得觀察：

- (1) 表面上的中美貿易戰場，本質上是美國在抑制中國崛起之挑戰其領導地位。中國之種種「不公平貿易」作為，給美國開啟貿易戰十足的藉口。中國威脅論或可歸類為 J. N. Bhagwati 於 1993 年所稱的“Diminished Giant Syndrome”（大國殞落症候群）。第一波貿易黃金時期末，英國得到這個症狀，美國則在 1980 年因為日本的崛起第一次患上此症，如今面對中國的崛起，再度出現同樣症狀。
- (2) 中國以外的歐盟、日本及澳洲等貿易大國，基本上亦認同美國對中國干涉市場經濟，進行不公平貿易與強迫技轉等等的各種控訴。
- (3) 中國在 2013 年倡議「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原始目的為因應美國前任歐巴馬總統之 TPP 的「經貿圍堵」，如今 TPP 變為 CPTPP 少了美國的參與，但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戰略上，卻已經為其打通一些關鍵性出口與通路及戰略據點。中國在某些方面取得天然資源的掌控權，但已經有些小國受牽制其「一帶一路」的貸款落入債務陷阱，或不得不交出國家資源控制權。後續勢必進一步影響資源依賴型產業的跨國競爭，極可能牽動新一波的貿易戰。
- (4) 經過第二波貿易的黃金年代，全球資源耗竭速度嚴重，電子與石化垃圾充斥地球。在天然資源不受限的前提下，所發展出來的貿易理論，無論是古典的以稟賦差異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或跨國垂直分工之產業內貿易理論，都再

也不能描寫未來的「資源有限」、「資源搶奪」乃至「垃圾」貿易受到抑制之前提下的「未來型」貿易情勢。

參考文獻

- Autor, David H., Dorn, David and Gordon H. Hanso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pp.2121-68
- Baldwin, R.E. (2004), “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KIEP CNAEC Research Series* 04-02.
- Baldwin, R.E. (2006),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 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29(11), 1451-1518.
- Barbara J. Spencer and Ronald W. Jones (1989), “Vertical Foreclos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20.
- Bhagwati, Jagdish N. (1993) “The Diminished Giant Syndrome.” *Foreign Affairs*, 72/2, 22.
- Campbell, Kurt M. and Ely Ratner (2018) “The China Reckoning.” *Foreign Affairs*, 97, pp.60-70.
- Feenstra, Robert C. (2010). “*Offsho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croeconomic 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MIT Press.
- Huang, Deng-Shing, Huang, Yo-Yi and Ching-lung Tsay (2018), “On the Determinant of Trading Hub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EAS Working Paper No. 18-A007
- Kuo, Chun-Chien (2018, Oct),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China: The New Trade Hubs in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aipei.
- Lee, Cheng-Te and Deng-Shing Huang (2017), "Asymmetric Glob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52), 402-408.
- Peter Navarro and Greg Autry (2011) “*Death by China*”. Prentice Hall, USA.
- Tyson, Laura D'Andrea (1992)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Yang, Tzu-Han (2018, Oct), “*The Evolution of the Textile Production Chain in the East Asia—from the viewpoint of hub and spok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aipei.
- Zheng Bijian (2005)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pp.18-24.
- 9 號文件報導資訊，請至 BBC 網頁查詢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8/130819_nytimes_cpc_document)。
- 李明軒(2014年8月20日)。中國大舉「反壟斷」的真面目。《天下雜誌》，第554期《中國威脅，全面來襲：複製你、超越你、取代你》，pp.152-153。
- 黃登興(2018)，全球經貿組織重整與保護主義再起，《2018年經濟年鑑》，頁5-11。